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10卷

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开放

[1976.10—1989.6]

曹 普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 10 卷

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开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史稿. 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开放:
1976.10~1989.6/柳建辉主编;曹普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0-08350-1

I. ①中… II. ①柳… ②曹… III. ①中国共产党
—党史—史料—1976~1989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073 号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IGAO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 10 卷)

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开放 [1976.10—1989.6]

柳建辉 主编
曹 普 著

策 划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解 伟
叶 勇
杨 潮
袁晓红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7.5

插 页

3

字 数

425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350-1

定 价

580.00 元 (全套共 12 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第一章 前进中的徘徊 ·····	(1)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与世界·····	(1)
第二节 揭批“四人帮”与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逐步恢复·····	(8)
第三节 整顿经济秩序与急于求成“新跃进”的出现·····	(26)
第四节 中国向何处去：“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	(35)
第二章 打破思想坚冰 ·····	(41)
第一节 澄清重大是非亟须确立“实践标准”·····	(41)
第二节 最初的突破：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57)
第三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	(62)
第四节 “砍旗”之责与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强力支持·····	(69)
第五节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高潮·····	(83)
第三章 划时代的转折 ·····	(92)
第一节 改革开放决策的高层酝酿·····	(92)
第二节 36天中央工作会议之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讨论·····	(105)
第三节 36天中央工作会议之二：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	(113)
第四节 36天中央工作会议之三：真理标准和人事问题的讨论 ·····	(118)
第五节 36天中央工作会议之四：“宣言书”的发表·····	(126)
第六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31)

第四章 全面拨乱反正	(140)
第一节 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发表.....	(140)
第二节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153)
第三节 调整社会关系,调动各方积极因素.....	(164)
第四节 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与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171)
第五节 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初步总结.....	(181)
第六节 起草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86)
第五章 改革开放起步	(205)
第一节 安徽四川引领农村改革兴起.....	(205)
第二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扩权”试点.....	(217)
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准备:走出国门看世界.....	(225)
第四节 兴办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突破口.....	(235)
第五节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249)
第六节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初步改革.....	(257)
第六章 新局面的开创	(273)
第一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273)
第二节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	(278)
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稳步推进.....	(291)
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306)
第五节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对外政策的调整.....	(311)
第六节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325)
第七章 形成新路轮廓	(330)
第一节 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改革纲领.....	(330)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339)
第三节 对外开放区域的进一步扩大.....	(345)
第四节 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350)
第五节 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	(361)
第六节 若干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和论证.....	(373)
第七节 党的十三大及其历史贡献.....	(390)

第八章 应对严峻考验	(396)
第一节 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96)
第二节 1988 年深化改革的方案和部署	(401)
第三节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	(405)
第四节 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和实施.....	(414)
第五节 国内政治风波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422)
第六节 新老中央领导集体平稳交接.....	(429)

第一章

前进中的徘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机。但是，十年内乱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大大落后，由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要在短期内消除更不容易。面对严峻局势，党中央也想有所作为，首先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并着手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但是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提出，又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阻挠，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与世界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中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中。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复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经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并取得中央政治局的认可后，于10月6日晚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的粉碎，标志着历时10年、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束。

10 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从政治上看，10 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损害了国家政权，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统计，“文化大革命”10 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 230 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 1200 万干部的 19.2%。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 729511 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 34800 多人^①。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 29885 人，占干部总数的 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 75%^②。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 26000 多件，被判刑的达 28000 多人。内蒙古“内人党”一案，则有 3.46 万人受迫害，16222 人被迫害致死^③。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从经济上看，“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工厂停工停产，农村田园荒芜，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国民收入损失了 5000 亿元，这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80%，相当于全国 40 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10 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从统计数字看，“文化大革命”10 年中，有 5 年经济增长不超过 4%，其中 3 年负增长：1967 年增长 -5.7%，1968 年增长 -4.1%，1976 年

① 《触目惊心的统计》，《北京晚报》1980 年 11 月 21 日。

② 《拨乱反正（中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8 页。

③ 《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 页。

增长-1.6%^①。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②。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云、贵、川、闽、浙、赣等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由于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国家财政连续3年出现赤字。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实行文化专制，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尤为严重，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百花凋零，学校停课，教育倒退，科学落后，文盲增多，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两线一会”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③。从1966年到1976年，10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亿3000多万多，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内伤所及，无形损失更大。在“左”倾思潮指导下，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被当做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发展生产力被批作“唯生产力论”，重视物质利益原则被批作“物质刺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黑白不明，是非混淆，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混乱。“文化大革命”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一些投机分子、

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8、282页。

②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③ 《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留下了巨大创伤。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破坏，全国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有些地方甚至严重“下降”^①。“文化大革命”前的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②。很多日常生活消费品需要凭票购买。粮票流行了40年，与人民币同等重要，被称为“第二货币”。“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成为人人向往的“四大件”。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的268650户^③。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农村的情况也很严重。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④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到中西部农村调查发现，1978年全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520页。

②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897—898页。

③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上），《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

④ 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元；陕西的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 元^①。而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农民年均收入只有达到 100 元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满足最低生活需要。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长期“左”的错误特别是 10 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相当集中而充分地暴露了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和弊端。极左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发展到极端，不能不迫使党和人民进行深刻的反思，获得新的觉醒和进步。正是在深刻反思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1987 年 6 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郑重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② 1988 年 7 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中国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③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经历“大跃进”、人

①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 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42 页。

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之时，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高潮。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利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 年 7 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 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 年 2 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 ENIAC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 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 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作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 年 10 月 4 日、11 月 3 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空间技术发展的新纪元。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 年 7 月，美国“阿波罗 11 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 年 4 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 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 DNA 重组实验；1978 年 7 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 1961 年 1 月到 1969 年 10 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 106 个月，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濒于崩溃。为了帮助欧洲经济摆脱困境，1947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

^①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 页。

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为期5年。到1951年底，“马歇尔计划”提前结束，美国对欧拨款共131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GDP增长了25%，欧洲经济由此走出困境。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联邦德国GDP增加了5倍多，是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年至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①。日本的发展更令人瞩目。1955年至196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8.5%，1960年至1965年为9.8%，1965年至1970年为11.8%。从1955年至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了7.2倍，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②。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后近20年，这个时期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后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大陆当年只有148亿美元^③。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成百上千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尤其深刻。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

①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②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③ 国务院办公厅[1978]12号参阅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1978年5月31日。

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① 1978年3月2日，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四人帮’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能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光喊口号没有用。”^②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③

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发出了重新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要坚持，但是，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未能体现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再也不能搞下去了，中国再也经受不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折腾了。

第二节 揭批“四人帮”与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逐步恢复

粉碎“四人帮”后，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即在全党展开。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列举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多次批评，号召全党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党罪行。11月15日至19日，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召开，通报经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工作要点”，部署彻底揭批“四人帮”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84页。

的斗争。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此后，罪行材料之二、之三相继下发。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此时发表毛泽东这篇1956年的讲话，既是表达对他的纪念，也是为揭批“四人帮”提供理论指导。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①按照以上部署，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迅速掀起。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为了加强和保证对党政军重要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进一步稳定政治局势，党中央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1976年10月下旬，由耿飫、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组成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王猛为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体委主任，免去庄则栋的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体委主任职务。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取消1976年2月2日作出的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决定，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主持，陈锡联协助。此后至1978年8月，中央先后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23个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局和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和调整，另派得力的干部前去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截至1978年8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而被撤职的有9人，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1/3左右。

“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人们深受动乱之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全党全国人民都期盼着真正的“安定团结”，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能够及早走上正轨。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中央政治局1976年10月7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再次“凤凰涅槃”式复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成果。早在1976年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证实后，邓小平就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①此后，叶剑英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向他及时通报中央的决策，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对邓小平所患前列腺炎进行手术治疗。动手术之前，经华国锋安排邓小平被接到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到1977年2月3日康复出院后，在叶剑英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住进北京西山中央军委25号楼。其间叶剑英派人将此时仍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在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②王震说：“邓小平政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还得到了耿飆、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讲到邓小平问题时，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①。华国锋的这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这样，经过努力，特别是党内老同志的不断呼吁和推动，到1977年初，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中央工作会议则明确表达了这个态度。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表明自己对于重新出来工作的想法。4月10日后，在邓小平重新出山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汪东兴、李鑫登山看望邓小平，商谈有关事宜。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4月10日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一同转发至县团级干部，这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977年7月21日，在正式复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再次表明了自己重新出来工作的态度：“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

^①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